

“自立”与“本色”的博弈

——基督教闸北堂风波解析*

张 化

【内容提要】 1923-1924年间,上海的基督教闸北堂发生了一场风波。多次筹款自建、迁建、扩建闸北堂的俞国楨初因霸占堂产被起诉,后被由长老会差会控制的苏州区会开除牧职,终被迫退休,闸北堂归长老会。这场风波在中国基督教史中意义重大,却未引起关注,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中一桩悬案。论文将叙述风波的具体过程,剖析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和以商务印书馆士绅为代表的闸北堂长老的关系,与中国基督徒会的关系,与长老会苏州区会的关系,解析为何在此时此教派发生风波,论证了风波的性质是“自立”与“本色”的博弈,以及“自立”与“本色”的本质区别,阐述了风波对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乃至对中国基督教史的影响。

【关键词】 自立 本色 俞国楨 闸北堂

1923-1924年间,上海的基督教闸北堂发生了一场风波。多次筹款自建、迁建、扩建闸北堂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①会长俞国楨,初因霸占堂

产罪名被起诉,后被长老会苏州区会^②开除牧职,终被迫退休,闸北堂归区会。这场风波至今尚未引起充分关注,是中国基督教史中的一桩悬案。本文将叙述风波的具体过程,剖析自立会与闸北堂的关系,与本色教会的关系,与长老会区会、大会、相关差会^③和传教士的关系,俞国楨与起事人、调停人的关系,解析为何在此时发生风波,以论证风波的性质是“自立”与“本色”的博弈,论述“自立”与“本色”的本质区别,阐述风波对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乃至对中国基督教史的影响。

一、风波过程一波三折

1923年,闸北堂领袖长老陈芷谷^④等人暗中拟将闸北堂交给长老会苏州区会掌管。当时,堂中有信徒168人,^⑤以牧师俞国楨为首的90多名主张自立的信徒坚决反对。他们认为陈芷谷等人是“断送主权”,^⑥区会是教阀式的“摧残自立,强制羁勒”,^⑦是“教业经【径】^⑧取。致函该区会,严词痛斥。并致杭州五省大会……以昭公理”。^⑨俞国楨驳斥区会、警告大会后,准备退出长老会,彻底自立,将闸北长老会堂改为“上海自立长老会堂”,向区会提出辞职。区会既不准其辞职,也不准其“自立”,而是让他告老退休,退还他当年建堂时所垫资金,闸北堂归长老会。

② 此时中国的长老会组织结构分四层:堂会、区会、大会、总会。闸北堂为堂会,属苏州区会、五省大会。苏州区会1912年设立,由美国南、北长老差会的中、西传道人员及长老组成,辖上海、浦东、江阴、苏州、常州等地堂会,执行机关设苏州。五省大会辖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执行机关设在杭州。

③ 差会系西方各国基督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下文“差会”指差会驻华机构。

④ 陈芷谷名安汝,学名书绅,字芷谷(1853-1942),浙江慈溪人,1872年与俞国楨同时毕业于杭州育英义塾。1882年到沪,任教中西书院20年,任英华书馆掌教30多年。1884年任沪北堂长老,1890年起任虹口堂长老。系上海第一位长老。

⑤ 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六十周年、新堂落成纪念特刊》,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印,1948年,第28页。

⑥ 《自立堂通告》,《圣报》第十四年第七期(1924年7月),第28页。

⑦ 庞子贤:《教阀(再续)》,《圣报》第十四年第八、九期(1924年8月),第10页。

⑧ 原文如此,疑为“径”字之误。

⑨ 《自主派的职责》,《圣报》第十四年第六期(1924年6月),第9页。

* 此文原载于《法流十道——近代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2013年6月,第139-172页。现经建道神学院出版部授权将简体版刊于此。

① 在不产生歧义时,下文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简称为“自立会”。

9月8日,俞国桢辗转反侧,终不成寐,至五更,下定决心不退让。9日,他在礼拜中当庭宣告“自垫的3330两不要,公会愿酬之养老金分文不受,束修或有或无亦不紧要,尽义务亦可,完全恢复主人地步。此刻我不休息,我不告退”。^⑩全体教友起立,不受欢迎。只有一个长老揽阻众人,称“我是长老主人翁……种种不入耳之言,激动众人,遂致群起而攻之”。^⑪俞国桢认为他是自取其辱,愚不可及。随后,他们“重行更选”^⑫了教堂的长老、执事。1923年底,陈芷谷等少数人退出闸北堂,在西宝兴里^⑬设临时礼拜场所礼拜。俞国桢等人如愿改了堂名,“声明退出素联情谊之区会”。^⑭又按自立会典章,于1924年初由徐亦庄等人出面,向教堂所在的宝山县公署呈请备案并申请财产保护。

苏州区会多次在沪召开特别区会,商量处理方案;又召开闸北堂执行董事部会议、行政会议进行协商,均不得要领。1924年3月,区会将此事交诸重华、李恒春等酌办。^⑮他们准备4月24日在杭州集中苏州区会的中西传道人开特别会议,作最后决断。但因未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⑯事后,五省大会委派苏美格、^⑰陈达三、^⑱路振文^⑲到闸北堂找俞国桢谈话,施加压力。俞国桢毫不退让,不留情面地诘问他们为什么不欢迎、支持纯正的自立教会?并声明,不管什么人,凡持这种态度,就没有发言权。弄得“委办等赧然,拂袖而去”。^⑳长老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

⑩ 上海闸北长老会堂牧者:《九月九号主日堂中宣言书》,《圣报》第十三年第十一期(1923年11月),第14页。

⑪ 同上。

⑫ 《俞牧师销假》,《圣报》第十三年第十期(1923年10月),第28页。

⑬ 《长老会苏州区会常会时地之通告》,《通问报》(总)1125回(1924年10月),第1页。

⑭ 《自立堂通告》,第28页。

⑮ 《教师会议教务》,《圣报》第十四年第五期(1924年5月),第22页。

⑯ 《又是特别区会》,《圣报》第十四年第六期(1924年6月),第9页。

⑰ 苏美格(J. E. Shoemaker),美国北长老会牧师、传教士。1894年来华,在浙江宁波、余姚等地传教,1935年退休。

⑱ 陈达三,长老会浙江地区华人领袖,杭州天水堂第一任华人牧师。

⑲ 路振文(1847-1935),长老会牧师,在浙江慈溪一带传教,时任牧师已半个世纪,其父路介臣是宁波长老会第一位长老。

⑳ 《谈话会的盲从》,《圣报》第十四年第七期(1924年7月),第14页。

常手段来处理风波。按自立会章程,牧师的“修金由各该堂公定”。^㉑3月16日,闸北堂执行董事部商定俞国桢的修金增加一倍,达每月80元。^㉒6月11日、18日,诸重华、李恒春两次在长老会机关刊物《通问报》上刊登声明书,以俞国桢未经区会同意自己加薪为由,开除其牧师职务。^㉓又将闸北堂呈请淞沪护军使公署备案。^㉔淞沪护军使公署于1925年1月被裁撤,备案自然无果。又由陈芷谷、鲍咸亨^㉕二人出面,在上海地方审判厅起诉俞国桢霸占堂产,私立教会,申请扣押查封闸北堂。^㉖法庭定于7月9日传讯。

自立会信徒认为,俞国桢“创办中国自立教会,推任为全国总牧师,或称监督,亦尚多年。国人早已咸知。故原任本堂之牧职,同人始终公认,在俞公固属两可”。^㉗让俞国桢声明从此不再使用长老会牧师身份。7月5日,90多名信徒在《申报》刊登启事,对同为基督徒的彼方竟为“细故”而“涉讼公庭”感到诧异,同时表明积极应诉的态度。^㉘

僵持中,俞国桢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和闸北社会各界的支持。4月19日,宝山县知事冯成发布《自立堂保护文告》,明确:宝通路堂由俞宗周^㉙一手落成,已载明县志,“该堂系自立自养、宣布福音为宗旨。自示之后,毋得藉端滋事,有碍进行。”^㉚7月7日,地审厅驳斥了陈芷谷扣押闸北堂的申请,裁定诉讼费用由申请方承担。^㉛7月5日晚,闸北虬宝商界联合

㉑ 《宪章商榷修正摘要之草案》,《圣报》第十四年第六期(1924年6月),第9页。

㉒ 《紧要教务·沪上之财力》,《圣报》第十四年第五期(1924年5月),第8页。

㉓ 《自立堂通告》,第29页。

㉔ 护军使是以军事为主,兼管民政的机构。

㉕ 鲍咸亨(1866-1931)是商务印书馆资方。毕业于中西书院,先任教职,次入海关,40岁后入商务印书馆,主理保险部事务。1908年起任海宁路堂长老,兼教会纪史。是鲍咸昌兄弟、陈芷谷连襟。

㉖ 《大中华圣徒启事》,《圣报》第十四年第八、九期(1924年8月),第30页。

㉗ 《自立堂通告》,第28-29页。

㉘ 《中华全国基督徒公鉴》,《申报》1924年7月5日,第1页。

㉙ 俞国桢,字宗周。

㉚ 《自立堂保护文告》,《圣报》第十四年第七期(1924年7月),第17页。

㉛ 《公布栏·上海地方审计厅》,《新闻报》1924年7月7日,第4页。

会^③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讨论闸北堂风波,认为俞国桢历来不争私权,所争系教会主权,决定出面援助俞国桢,“派员与各方接洽,藉张公道。”^④经他们联络,10日,崇海旅沪工商学会、工商友谊会、山东路市民公学、沪海工商学会、同芳公学、无锡驻沪劳工会、壬戌友谊社上海总部、上海铸业公团永义堂、上海铸业学校等9个团体、学校登报声援支持。^⑤

长老会则请上海基督徒中的实力派人物出面调解。7月8日,由郭挺生、赵晋卿、陈金镛、鲍咸昌、曾绍贤、鲍哲泰、王显华、高凤池作调停人,在老北门浸会堂“集议”。俞国桢不愿参加。他们用汽车强行接他到会。集议从19:00延续到第二天凌晨3:00,订信约5条,包括:区会发表声明恢复俞国桢名誉;起诉人撤回诉状,于7月20日到闸北堂向众教友道歉,并登报道歉;俞国桢从8月11日起退休,长老会接管闸北堂,按月付俞养老金,一次性送修养金2000元、杂费500元,正式退休时再送大银杯一只。^⑥但众教友知情后认为“曾绍贤等偏袒徇私”,^⑦虽有3、4个教友在场见议,但并非公推代表,不能代表闸北堂作决定;俞牧师年逾古稀,时值深宵,又无法退出,属被迫定约。因此,这项信约于法理不合,只能算私人行为。他们在《商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声明,誓不承认此信约,“仍不承认俞牧师解除职务。”^⑧俞国桢照旧主持闸北堂宗教活动。

长老会不得不进一步采取非常手段处理风波。9月7日,俞国桢带领信徒做完礼拜,调停人率领对方人员冲到教堂,将银杯硬塞给俞国桢,寓意俞立即退休。众教友起而抗争,以各种问题尚未公决,仍推俞牧师为教堂总主任。调停人扫兴而去。^⑨10月1日,高凤池在《通问报》发表紧要启事,称因俞国桢未履约退职,自己调停无效,不再担任调停人,并

让俞国桢将收去之款及银杯退还经手人。10月10日,俞国桢在《申报》发表紧要启事,说明事实,辩解未退职的原因是对方未履行另3条约定,包括区会公开道歉、声明取消诉讼、起事人到堂向教友道歉。因此,“背约之责,在彼不在此。”^⑩10月15日,陈芷谷、鲍咸亨送函给俞国桢,并刊登于《申报》,指责俞国桢不履行约定,称再宽限10天,“倘逾期不退,惟有仍以诉诸法庭。”^⑪事实上,最后是长老会履行了约定:11月12日,刘道生代表区会、鲍咸昌代表陈芷谷、鲍咸亨二位长老,就损毁自立会和俞国桢名誉事到闸北堂当众道歉。区会全权委办诸重华等登报道歉,恢复俞国桢的牧师职务,将以前所有诉讼、通告、记录,一概取消。^⑫22日,闸北堂召开堂会,由原委办讨论改组方案,包括俞国桢、陈芷谷、鲍咸亨在内的旧职员全体辞职,^⑬区会另派牧师,堂会另选长老、执事。闸北堂终归长老会。

在此过程中,区会提出的一些理由并不成立。比如,以俞国桢年老为由让其退休。1924年,俞国桢71岁。五省大会处理风波的委办路振文77岁,1923年才正式退休。^⑭早在1915年,路振文因年老向中会^⑮辞职,因堂会长老、执事“联名具稟中会挽留。后蒙中会复函准如所请”。^⑯再比如,以俞国桢“加薪”为由开除其牧职。第一,加薪是俞国桢脱离长老会后,按自立会规则行事的結果。第二,此时长老会牧师薪酬可能确实偏低。风波平息后,五省大会也建议总会“现在生活程度日渐增高,凡传道教员以及其他在教会服务人员之薪金,应重加考虑”。^⑰

由前述可见,长老会为争夺闸北堂,使用了教会权威、金钱、神权、法律、舆论、社会力量等办法对付自立会和俞国桢,软硬兼施,步步紧逼。第一步,准备不动声色让闸北堂归长老会。这相反警醒并促使俞国桢带

③ 1923年9月3日成立,属马路商会。

④ 《闸北虬宝商联合会紧急会纪》,《民国日报》1924年7月7日,第11页。

⑤ 《各团体为俞宗周张公道》,《商报》1924年7月10日,第4张第3版。

⑥ 《闸北长老会堂讼案解决》,《民国日报》1924年7月9日,第11页。

⑦ 《长老会教友挽留俞牧师》,《民国日报》1924年7月29日,第11页。

⑧ 《自立长老会纠葛未已》,《民国日报》1924年7月20日,第11页。

⑨ 《自立长老会最近讯》,《圣报》第十四年第十期(1924年10月),第26页。

⑩ 《张一鹏律师代表俞宗周紧要启事》,《申报》1924年10月10日,第1页。

⑪ 《律师李祖虞代表闸北长老会通告俞宗周》,《申报》1924年10月15日,第1页。

⑫ 《长老会苏州区会说》,《圣报》第十四年第十二期(1924年12月),第28页。

⑬ 《长老会堂事结束》,《圣报》第十四年第十二期(1924年12月),第24页。

⑭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常会编:《逝世同工小史(1933-1937)》,第29页。

⑮ 当时的中会相当于后来的区会。

⑯ 朱恩泽:《挽留牧师之诚恳》,《通问报》(总)687回(1916年2月),第8页。

⑰ 《江浙湖南江安三区会代表联席会议对于长老会审计会议意见书》,《通问报》(总)1225回(1926年11月),第9页。

此,差会司库来函宣告与该堂断绝经济关系。^⑤ 1914年,因信徒增加,海宁路堂座席容纳不下,俞国桢等出售地价已涨的海宁路堂,在宝通路购地2.3亩,建教堂一座、牧师住宅一所。^⑥ 1915年6月13日落成,称闸北长老会堂,又称宝通路长老会堂、闸北自立长老会堂。^⑦ 此后,该堂“牧师之束修、公会之开销、会友之矜恤、团体之公益、堂宇之岁修,以及种种慈善、赈灾等常年度支,平均一千六百元之谱,纯系华信徒完全担负”。^⑧ 在1920年代初之前,闸北堂是上海第二大堂。

自立会与闸北堂相生相伴。1905 年冬,俞国桢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设临时事务所于海宁路堂,⁶³布道地点也在该堂。⁶⁴海宁路堂迁至宝通路之前,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事务所、圣报馆及布道处租设于沪宁火车站北义品里 258 号原俞国桢住宅。⁶⁵自立会会员来自各宗派,有的甚至不信基督教,但支持教会自立。自立会总会没有自己的信徒,“同志十年来所守主日各在其母会”,⁶⁶1915 年 5 月 23 日起,以上海耶稣教自立会名义在义品里礼拜。由自立会骨干主持宗教活动。礼拜时间与各教堂错开,多在晚上或下午。信徒来自各教会,以闸北堂为主。俞

(接上頁)僅有之文舉也，願至諷率者。今將董事眾銜開列于右：鮑咸昌、夏粹芳、沈緩云、張秉堂、肖連生、方同生、鮑咸恩、張桂華、柯釗生、周夢香、高風池、徐維繪、鮑哲泰。

今收到 先生名下英洋 元。虹口公会牧师俞宗周、执事徐维绘、长老陈芷谷、董事鲍哲泰。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立

⑤《自立堂保护文告》，第17页。

⑤ 由于宝通路离城市中心稍远,基本上是等价置换:出售海宁路堂得银 11000 两,购宝通路购地用 4500 两,建教堂 5000 两,牧师住宅 1700 两。参见《上海闸北长老会史》,《圣报》第十三年第十二期(1923 年 12 月),第 9 页。

④ 1922年5月6日,上海各教堂联合召开欢迎会,招待到沪参加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的代表。其中第6座教堂即是“宝通路闸北自立长老会”。参见《中华归主》第23期(1922年6月10日),第5页。

⑩ 俞宗周：《闸北长老会堂记》，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年鉴》第7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3年，第90页。

② 庞树桑：《本会沿革》，《圣报》俞公宗周专号（1933年1月），第5页。

③ 觉非：《新辟布道处》，《圣报》第五年第五期（1915年5月），第9页。

④ 《注意迁移广告》，《圣报》第五年第一期（1915年1月），封三；觉非：《新辟布道处》，第9页。

⑥ 觉非：《上海总会议事纪要》，《圣报》第五年第六期（1915年6月），第9页。

日 上午主持闸北堂礼拜,其余时间客串义品
国桢虽是灵魂人物,但他主品里房屋租期已满,自立会总会事务所及圣
里礼拜。1921年2月,因宅,⑥ 闸北堂俨然成为自立会总堂。1918年
报馆均移至闸北堂俞国桢建全国总堂。后有曾国藩孙子曾季融来沪组
起,自立会发起建堂捐,筹一大中华纱厂总经理聂云台的母亲曾纪芬捐
织协赞会,1921年代其姑⑦ 1924年10月——风波的关键时刻——聂
赠价值2万元的二分地皮,自立会在江湾翔殷路购地4.2亩,于1929年
家收回捐赠承诺。1926年7月正式启用。⑧
勉力建成永志堂,1930年本较多,是否加“自立”两字比较随意。看来
风波之前

家收回捐赠承诺。1926年1月正式启用。^⑤ 勉力建成永志堂,1930年,是否加“自立”两字比较随意。看来,由前述可见,该堂名有“自立”二字,而是教堂的归属。风波之前,问题的关键不是堂名是否明确过教堂归属问题。直到1926年,区会才吸取区会和自立会从未讨论、立公产善捐管理处,规范属下各堂会财产的归属和管理的教训,设属和管理。^⑥ 确实很纠结:属长老会,又属自立会。之所以两

取闸北堂风波的教训，设
属和管理。^⑨

闸北堂的归属问题，
属，是因为俞国桢一身而
发起人和会长。1924年
国桢均归长老会；但基
国耶稣教自立会总堂牧
职务行为，闸北堂只是
国桢只是以长老会一个
模的自立教堂。连高反

角实很纠结：属长老会，又属自立会。之所以两
兼两职：他是长老会的受薪牧师；又是自立会的
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对教牧人员的统计，俞
教界又普遍认为俞国桢是自立会的代表，是中
师。^⑩对长老会而言，俞国桢筹款建堂是牧师的
多实现了自养的教堂之一。对自立会而言，俞
租屋布道的小堂为出发点，创建了一个有相当规
池早年也认为该堂是自立会的。^⑪该堂绝大多

⑥ 《圣报启事·地点迁移》，《圣报》第十一年第一期（1921年1月）通讯地址仍为义品里，第2期已改为宝通路俞公馆。《圣报》第十一年第三期（1921年3月），第16页之三；又，《圣报》第十一年第二期（1921年2月），扉页。

⑦《俞宗周为建总堂敬告认》，8页。

⑤ 庞树桑：《本会沿革》，第 1 上拟定草案，《通通报》（总）1221 回（1926 年）。

④ 王完白：《公产善捐管理处》，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公产善捐管理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1948年。

⑦《著者小记·俞国桢》，中央代表出席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近六十年

又,俞国楨作为自立会的(1922年6月10日),第4,8页。

《中华归主》第23期(1924年7月),国桢:交上“弟名下贵会建堂股票及总汇”,《圣报》第十四年第七期(1924年7月),第15页。

⑦ 1909年，高凤池写信给俞十一七年前的一封信》，《圣报》第十四年第七期。

利,捐入“贵会”。参见《十

数信徒系受俞国桢感召而入教,多数主张自立。俞国桢以长老会牧师名义所受之薪与闸北堂一切开支均来自主张自立的中国信徒的捐款。没有闸北堂,俞国桢将失去实践自立的舞台;没有俞国桢以自立为号召,闸北堂不可能募到这么多款项,由自养而自治、自立。对俞国桢而言,长老会牧师只是他的职业,自立会才是他的事业。

三、风波前,俞国桢与起事人、调停人甚至 区会华人代表志同道合、关系融洽

1. 风波前,他们都是“自立”的倡导者、推动者

他们大多是中国基督教“自立”的重要倡导人。高凤池早在1900年就在闸北恒业路创设上海基督教会(自理会)。^②1902年,高凤池、李恒春、邬挺生与夏瑞芳、谢洪赉等发起中国基督徒会,^③李恒春曾任会长。该会“妥筹预弭教祸之法”,宣传“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之要理”。^④香港、北京、赣州等地信徒纷纷响应,成立支会,鼎盛时有2000多名会员,1915年后才停办。王显华曾是非常激进的自立派。他在中国基督徒会所办刊物《基督徒报》上发表文章,称传教士有间谍嫌疑。认为传教士深入内地,撰写反映中国各方面情况的著作,“教士即不为警探,而其政府用之,固无异警探。”^⑤“西人既以传教为引线,华人乃以信教为怨府”,^⑥教案必不可免。所以,必须自立。

他们曾大力支持自立会和俞国桢。陈芷谷、高凤池、鲍咸昌、鲍哲泰都是海宁路堂垫资者,^⑦后来都放弃未收的本利,以表达“素日私淑自立之诚”。^⑧鲍咸亨与俞国桢是中国基督徒会和闸北堂的同志加同工。1911

年,俞国桢任中国基督徒会会正,鲍咸亨任司库。鲍咸亨是鲍氏兄弟中唯一的闸北堂教友,1908年起当选长老,兼任堂会纪史。鲍咸昌是自立会的重要支持者。1920年,他在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上致词,称赞自立会“教柄实操之一己,功高日月,名著鼎钟”。^⑨他还邀请全体代表参观印书馆,观摩自拍的电影;送每位代表西点一筐、扇子一把、书报一封,又为活动拍纪录片。^⑩至今广为流传的大会全体代表合影,即在印书馆花园内拍摄。

1911年,海宁路堂也发生过一起针对俞国桢的风波,陈芷谷竭力支持俞国桢。当时,该堂执事徐维绘找俞国桢开“谈判会”,批评俞主日穿军装上讲台演说,^⑪自立会与长老会界限不清。陈芷谷知道后,斥责徐“蕴蓄私意”,又召集全体教友进行解释:“自立会事,系虔诚基督徒者所共宜肩任。既各处响应,成效显著,吾辈方念俞牧公务烦杂,内外多劳,本拟聘任助师,以为襄理。实因款项无从出,只可从缓。而事之有关公益,内外无问言。不料因此而反滋物议。是无识见者所为……戎服演说而行于主日,实为赈济起见。赈济善端也……何得吹毛求疵而议于后。”^⑫他让全体信徒举手表决,认定这两端均为当行之举;又写信给俞国桢,进行安抚;还非常绅士地承担起应对长老会中会、大会可能责问的责任。按常理,牧师穿“军服”是非常年代的非常之举,主日穿“军服”上台演讲,确实让信徒难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陈芷谷仍竭力为他辩解、担当。可见其对自立会和俞国桢的支持力度。有趣的是,1920年,徐维绘一变而为自立会的得力支持者、资助人。他在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上演讲,愿为自立会募捐15000元。^⑬

^② 鲍咸昌:《欢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代表词》,《圣报》第十年第八期(1920年8月),第17页。

^③ 乐诗农:《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摘要》,《圣报》第十年第八期(1920年8月),第11、15页。

^④ 这年3月,俞国桢与钱淦、钱允利等组织闸北商团,任副会长,为辛亥革命奔走。在光复上海过程中,闸北商团在占领闸北后,维持治安,会攻制造局,赶走万国商团,进驻沪宁车站,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估计俞国桢此时常穿团服。而闸北商团的团服系仿造陆军军服,粗看就是军装。

^⑤ 《十五年前的一封信》,《圣报》十四年第六期(1924年6月),第11页。

^⑥ 乐诗农:《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摘要》,第2页。

^⑦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554页。

^⑧ 一氓编述:《中国基督徒会小史》,《中国基督徒报》第51号(1914年春),第12页。

^⑨ 《中国基督徒会小启》,《中西教会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第14页。

^⑩ 王显华、任芳荳:《论教会不自立之危机》,《基督徒报》第31号(1911年5月),第2b页。

^⑪ 同上,第3a页。

^⑫ 此时10位垫资者中3位已过世,他们4人占了一半多,俞国桢和徐亦庄主张自立,只有郁厚坤未介入这场风波。

^⑬ 《十七年前的一封信》,第15页。

2. 风波前,俞国桢和起事人的私人关系非常融洽

在俞国桢看来,陈芷谷是德高望重的谦谦君子,“处世接物,计不爽凉。”^④他俩是50多年的朋友,“气味相投,最称莫逆。”^⑤直到1923年1月,俞国桢还发表祝寿文,炫耀他们的友谊,特别是四同:同砚、同班、同乡、同年。1894年,经陈芷谷提议和运作,才把俞国桢请到上海。^⑥

俞国桢与鲍咸亨的私交也很好。俞国桢曾出力为鲍处理难办的私事:1917年,居住在中兴路的鲍咸亨拟买邻居严发祖传的6间屋基,严只租不卖,已拟就租契,由严保管,约定数日后双方签字生效。届时严反悔。俞国桢即亲笔写信给他的朋友、闸北工巡捐局分办处工程员王栋,^⑦要求王在严未归还租契并赔偿一年租金前,不发营造执照。又出面调解,由严自建住房五间,将位于鲍氏大门前的一间屋基租给鲍。因租金未谈妥,严不租。俞国桢再次写信给王栋,让严“必须让出一间方可”,^⑧要求王不发这一间的营造执照。严到工巡捐分局催办近百次无效,愤极,登报揭发王不肯给照,同时向市工巡捐总局及沪海道尹公署控告,请求彻究。俞国桢又在报上说明情况,为王开脱责任。凭心而论,租契未签字前并未生效,俞国桢要严赔偿已属过分,又用社会关系为鲍咸亨压严,闹到登报指控、上访的程度。真可谓为朋友两肋插刀了。

由前述可见,起事人、调停人,甚至区会华人代表并非不赞成自立,亦非个人恩怨而向俞国桢发难。在俞国桢看来,是区会“怂恿陈芷谷等,架词朦【蒙】^⑨诉”。^⑩

④ 俞国桢:《颂同年陈长老寿文》,《圣报》第十三年第一期(1923年1月),第15页。

⑤ 同上。

⑥ 周梅阁:《陈芷谷先生行述》,1942年,第11页。

⑦ 王栋(1874-1948),字彬彦,曾任闸北市政厅、闸北工巡捐局分办处、沪北工巡捐局工程处工程员、科长、主任,闸北慈善团会长、闸北保卫团团总、上海市总商会常务委员、闸北商业公会副会长等职。与俞国桢是闸北自治、慈善等活动的志同道合者。

⑧ 俞国桢手书5月16日给王彬彦的信,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204-1-79,第22页。

⑨ 原文如此,疑为“蒙”字之误。

⑩ 《大中华圣徒启事》,第30页。

四、风波前,自立会与本色教会关系正常

1920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沪召开全国联合大会,后来的本色教会态度比较积极。到会演讲的有:中华全国基督教勉励会总干事、美国传教士施嘉达,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美国传教士饶柏林,瑞士自立传道牧师毕胜道,广学会主任编辑员陈金镛牧师,监理会百年大会筹备处处长李仲覃牧师,中华教育卫生联合会干事胡宣明博士;参加大会的有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吴板桥、^⑪圣公会救主堂牧师朱葆元、浸礼会真神堂代表余士廉、卫理公会慕尔堂周子松、浸会堂陈佐卿等。《通问报》发表欢迎词。但闸北堂所属的美国北长老会差会和苏州区会没有派代表参加。

1922年召开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大会是推进本色教会的重要节点,随之成立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是本色教会的重要推进者。自立会与其他教派一样参与其中。大会代表按信徒人数选派,浙江、福建、江苏、湖北、山西自立会共派出24位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但10天会议中,自立会代表未作大会发言。协进会由10个主要宗派及学校、男女青年会等75位代表组成,自立会是主要宗派之一,有3个代表名额,占总数的4%。自立会作为协进会的团体会员,历次年会都派代表与会。^⑫1923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还收录了俞国桢介绍闸北堂、庞子贤介绍上海耶稣教自立会的文章。

诚静怡是华人中推进本色教会的重要代表,俞国桢与之关系密切。早在1910年俞国桢进京向皇室贡呈圣经时,就联络了诚静怡等10人,发起宗教自由请愿会。号召全国基督徒组织起来,向朝廷请愿,要求宗教自由。^⑬他们在自立问题上曾志同道合,互相呼应。1915年,诚静怡曾请《圣报》帮助刊登北京中华基督教会谋求自立的新闻稿。^⑭1916年,

⑪ 吴板桥(Woodbridge, Samuel Isett, 1856-1926),1901年在沪创办《通问报》(The Chinese Christian Intelligencer),自任主编。

⑫ 《总务委员会通告(二)》,《圣报》第二十二年第十二期(1932年12月),扉页。

⑬ 《发起宗教自由请愿会缘起》,《中西教会报》1911年3月,第45页。

⑭ 孟继曾:《北京中华基督教会面面观》,《圣报》第五年第十期(1915年10月),第6页。

诚静怡又请求《圣报》按月刊登他关于祈祷问题的短论。^⑤ 诚静怡也大力支持自立会。1919年,俞国桢和诚静怡、聂云台等共同发起中华基督教协赞会,^⑥帮助筹款建筑全国总会总堂。在风波过程中及俞国桢有生之年,未见诚静怡对俞发难的记载;甚至在俞国桢点名批评诚静怡的情况下,也未见诚辩解;俞去世后,诚高度评价其“倡导自立”之功。^⑦

由前述可见,风波之前,本色教会对自立会基本能一视同仁,自立会也积极参与本色教会,俞国桢和本色教会中的中国人意气相投,关系密切。

五、风波前后,俞国桢、自立会与 长老会差会关系始终紧张

1. 长老会差会认为俞国桢自立是“华人无良”

长老会是中国基督教自养、自立、合一的重要推手,也是组成中华基督教会的主体。长老会实行代议制,地方会务取决于堂会,堂会会务取决于教友,应该比其他教派更民主,更能遵从中国教友的意向。但事实上,直到风波发生前后,仍是“差会教会”,一切事工由差会掌控,中国人没有参与权,“支配经济、更动人员,更非华人所能过问。”^⑧1926年10月,在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波高潮中,长老会作出“重要”调整:“在差会尚未将一切事权移交中华基督教会以前,长老会差会、总部差会、支差会、并差会支差会之紧要委员会,开会讨论教会事工时,应有相当中国代表出席参与。”^⑨这一仅让中国代表参与讨论的调整也非常来之不易:讨论了3天,大多数传教士仍不赞成。美国总差会来华代表不得不改变方式,先开委办会议通过,再交全体传教士讨论,方才勉强通过。而早在1900年代,自立会就“并无西人插足其间”,^⑩当然会“大遭西教会之仇

⑤ 《诚静怡牧师来函》,《圣报》第六年第二期(1916年2月),第13b页。

⑥ 《中华基督教协赞会宣言》,《圣报》第十年第一期(1920年1月),第13页。

⑦ 诚静怡:《宗周牧师千古》,《圣报》第二十二年第十二期(1932年12月),第16页。

⑧ 彭长琳:《长老会审计会议纪要》,《通问报》(总)1225回(1926年11月),第9页。

⑨ 彭长琳:《长老会审计会议纪要》,《通问报》(总)1225回(1926年11月),第9页。

⑩ 《追录鼓吹自立会之缘起(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之命名及宗旨)》,《圣报》第十四年第七期(1924年7月),第2页。

视”。^⑪ 俞国桢建海宁路堂得不到差会的资助,就是因为“该西教士^⑫,必欲以权隶己……后见其热血潮涌,不可复遏,乃徒叹谓华人无良而已”。^⑬ 也就是说,俞国桢尝试自立之初,即是其被视为“无良”华人之始。

2. 区会认为俞国桢不尽牧师职责,过于世俗化

风波中,彼方指责俞国桢“牧师不尽其职”。^⑭ 俞国桢确实花了大量精力从事非区会布置给他、亦非牧师本职的活动。他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一说曾参加同盟会。^⑮ 因组织闸北商团有功,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陈其美给俞国桢颁功臣奖凭。^⑯ 他积极参与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在抵制美货、保路、禁烟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闸北市民公会^⑰选举他为领袖。1917年,闸北地方自治研究会选举他为会长。他在应对闸北堂风波的同时,还在参与闸北地方自治活动:1924年江浙战争前后,地方不靖,盗风日炽。5月15日,闸北地方自治筹备会^⑱讨论如何保护商铺,俞国桢被推为会议主席。^⑲ 7月3日,俞国桢为闸北市^⑳议会

⑪ 柴连复:《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第94页。

⑫ “该西教士”应该就是范约翰。俞国桢到沪接其虹口堂牧职后,“公虽不负名义,而从旁相助,亦颇得力,即本堂之得以早脱差会资助,而成自立自养之堂,亦多受公之激励也。”参见《本堂前任工作人员略传·署理牧师范约翰先生》,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六十周年、新堂落成纪念特刊》,第27页。

⑬ 王显华、任芳萱:《论教会不自立之危机》,第2页。

⑭ 上海闸北长老会堂牧者:《九月九号主日堂中宣言书》,《圣报》第十三年第十一期(1923年11月),第14页。

⑮ 沈以藩:《抚今思昔,继往开来——祝上海闸北堂成立一百周年》,《上海市基督教闸北堂创立壹百周年纪念特辑(1888-1988)》,第3页。

⑯ 尹村夫:《闸北商团与上海光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212页。

⑰ 为闸北市的代议机构。

⑱ 1921年,官方允许各地恢复地方自治,闸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改名为闸北地方自治筹备会。

⑲ 《闸北自治会讨论防盗》,《民国日报》1924年5月16日,第10页。

⑳ 1912年设闸北市,因地跨上海、宝山两县,故由上海、宝山两县共管;相当于“镇”,闸北市长又称闸北市政厅长。

选举一事,牵头呈报上海、宝山两县,要求颁发委任状,争取选举合法性。^⑩7月24日,俞国桢又与10多位地方士绅商议成立闸北市政协会,以研究地方自治,补助地方市政所不及。^⑪因战事随即爆发,这些自治活动均不了了之。这一年,闸北绅商为争取闸北水电归地方商办,组织请愿团多次赴南京请愿,俞国桢被举为团长。^⑫他积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被举为万国改良会会长、中华公义会总董、杭州聋哑学校总董、浦西公益会总董等职,另兼救火会、孤儿院、济良所、各慈善机关的名誉董事、会董、职员等职,不胜枚举。^⑬自立会事业更是占用了他的主要精力。1923年6-8月,他离沪赴外埠处理自立会事务达40天。^⑭

俞国桢抽板烟。^⑮闸北堂信徒至今对此还颇有微词,这也明显有违牧师的行为规范。1919年,基督教江浙联合会专门作出决定:“教会领袖当一体禁绝烟酒,为社会倡。”^⑯

3. 俞国桢在长老会学历高、资格老、能力强,但始终未得重用

俞国桢的学历在当时非常有竞争力。他幼年就读乡塾,1866年入甬江北岸美国长老差会学堂^⑰求学,1872年毕业。该校又是中国创办最早的训练中国传道人才的圣经学校。1874年,他再入育英书院,专攻神学,^⑱1877年毕业。而在1900年前,一般“读过私塾的,或有小学程度

^⑩ 《闸北市选案之文牍》,《民国日报》1924年7月4日,第11页。

^⑪ 《闸北市政协开会纪》,《民国日报》1924年7月25日,第11页。

^⑫ 《俞公生平事迹》,第3-5页。

^⑬ 金策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会长俞牧国桢小史》,《圣报》第十年第八期(1920年8月),第19页。

^⑭ 6月20-26日,参加杭州之江大学毕业典礼;7月2-13日,在镇海查办会员房产事宜;8月4-8日,在苏州处理新创江苏省第12分会筹备事宜;15-30日,巡视河南自立会。见《圣报》第十三年第十期(1923年10月),第26页。

^⑮ 板烟即用烟斗吸旱烟。据笔者2007年5月5日走访闸北堂80岁老徐伟的口述。

^⑯ 《基督教江浙联合会第一次集会纪录》,《通问报》(总)860回(1919年7月),第3页。

^⑰ 该校又称崇信义塾,1867年迁杭州,称育英义塾,后发展为育英书院、之江大学。

^⑱ 鲍明鉴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7页。

的,就可入圣经学校,或神学院”。^⑲俞国桢隆然道貌,口才极好,擅长讲道,所到之处,群情踊跃,风俗顿易,教会随之兴盛。但他从准试到封牧,历时11年,比同会、同时代其他人时间要长得多。^⑳俞国桢绝大多数时间在宁绍传教区的边缘地区传道。^㉑1872年毕业时,他任鄞县高桥镇教会小学教员,陈芷谷留校工作。1889年,因妻子病故,他要求辞去远离家乡的新市牧职,未获批准。1893年,上海虹口函请俞国桢,宁绍中会不准。拖到1894年,上海再派陈芷谷稟请,才获批准。^㉒到上海后,也未见其在长老会系统担任重要职务的记载。所以,在风波中才出现“区会一班后生小子,藉词开除”^㉓老前辈的怪现象。

通过前几节的排除法描述可见:风波前,闸北堂的归属从来不是个问题;自立会、俞国桢与起事人、调停人在自立问题上意见一致,没有个人恩怨;与本色教会关系正常,与其中的中国人关系融洽;差会教会虽不善待他,倒也相安无事。那么,为何此时剧烈博弈?

六、此时博弈是因为自立会成为本色教会建立中华基督教会的关键性障碍

1. 自立会日益壮大,发展势头迅猛,已成一支不能漠视的力量

进入民国,自立会快速发展。1920年7月,自立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30人,代表了全国16省和南洋各埠,审定了章程,票选俞国桢为总会长,选出各省董事39人。也就是说,经过代表大会和选举,自立会全国总会获得了法理上的合法性。据1924年底

^⑲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第648页。

^⑳ 俞国桢当时属宁绍中会,1877年准试,1888年封牧;同会的谢志绍1889年准试,1893年封牧;汪孝奎1890年准试,1894年封牧;鲍明鉴1889年准试,1895年封牧。参见鲍明鉴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

^㉑ 俞国桢先后在高桥、杭州、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分水、桐庐、新城、富阳、诸暨、东阳、严州、湖州、徽州、屯溪(今黄山市)、德清、新市等地传教。参见鲍明鉴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

^㉒ 鲍明鉴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第230-231页。

^㉓ 《自立堂通告》,第29页。

2. 本色教会已逐渐明晰“中西共管”的教会管理模式

⑤ 1924年全国正式教徒数不详,1922年有386524人。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1页。

^⑫ 《驳大中华厂总理反教辨惑复函》，《圣报》第十五年第一期（1925年1月），第12页。

① 韩镜湖：《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纪实》，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年鉴》第6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1年，第57页。

^⑫ 全国正式基督徒人数 1918 年为 35 万。参见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第 148 页。

② 根据刘家峰对诚静怡的研究,诚氏在1922年前的中文著述中没有使用过“本色教会”或“本色化”一词,英文著述中用过 indigenous church,但他用 Chinese church 更多,还常用 naturalized 来表达后来的本色教会思想。引自刘家峰:《从差会到教会:诚静怡的本色教会思想解析》,参见刘家峰编:《离异与融合: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⑬ 易文思：《西教士对于中国的基督教会应采取的态度——1922.5.4 在全国大会演讲》，《生命》第2卷第9期（1922年6月），文内第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U120-0-438-636，第21页。

后来的史实证明：本色教会一般由差会教会翻牌或联合组成，由中西人士共组教会领导机构，差会向这个机构交权。虽不少主要职务由华人担任，但直到1949年，经济、人事实权还是由差会掌控。本色教会实际上是一种差会无需交出教权，又让中国教会“自立”的模式。“本色教会”的设立和发展，使得自立教会似乎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和空间，甚至成为障碍。

3. 中华基督教会筹备数年,自立会成为建会关键性障碍

中华基督教会是本色运动和合一运动的产物和典范。初由长老会等 16 个宗派联合组成,受餐信徒 120175 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三分之一。^④

之一。^⑧在筹建中华基督教会过程中,长老会起步最早,始终是主力。一度稳步推进,成效显著,这时却遇阻停滞。在各教派联合之前,教派内部先联合。1901年10月,长老会率先在上海成立中国基督教长老会联合会,并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会之合一》的决议,“议决先由长老宗各教会入手。”^⑨1913年的全国基督教大会,通过了《中国教会统一之预备》的决议案,确定用“中华基督教会”作为教会的通用名称。此后,各宗派的联合次第实现。但在长老会内部,由于信仰上“新派”和福音派的差别,1917年,华北2万福音派信徒与“新派”分道扬镳,^⑩长老会约四分之一的信徒分裂出去。^⑪1918年,长老会将联合会改组为中华基督教长老

⑩ 高伯兰：《中华基督教会总会概述》，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0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8年，第三部分第1页。

⑩ 高伯兰：《教会合一运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年鉴》第11期，第4页。

⑬ 在福音派看来,“新派”实为不信派,本着“信的与不信的不当同负一轭”的命令,与“新派”分手。福音派于1929年成立中华基督教长老会总会,又于1947年10月改名为中国基督教长老总会,至1950年有3万信徒,会长贾玉铭。参见道雅伯:《中国基督教长老会史略》,上海档案馆档案:U110-0-6,第3,6页。

^⑤ 此时长老会有教友8万人。参见陈春生：《本年教会大事概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年鉴》第5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18年，第8页。

会临时总会。公理会、伦敦会派代表与会，成立了公理、伦敦、长老公会之联合会，^②努力推进合一。中国代表认为，应该不仅组织一个联合会，更应组织一个统一的教会；不仅是此三宗派统一，也应接纳所有愿意参与的宗派。1922年4月，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全国总会，将组织统一教会的提议“发给各部分通过承认”，^③“若得有区会三分之二赞成者，即可实行合一。”^④与此同时，长老会在内部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抢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之前，迫不及待地、不“合法”地与公理会、伦敦会等联合召开了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临时总会。

在全国范围内,1907年山东的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的部分区会,在济南组成了教会协会(或称联会);^⑩1912年圣公会组成中华圣公会;1917年信义会组成中华信义会;1918年苏申浸礼会年议会决议组织中华基督教浸会总会,美国国内的美以美会和监理会合并,中国“该两会合一之声,已日唱日高”;^⑪1919年广东省八大会派^⑫联合成立广东中华基督教会;1920年福建的三大会派^⑬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合一会,湖北也积极推进联合。1922年召开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大会,主题是“中国教会”,核心问题是本色和合一。再者,1922年开始的非基运动其实是一场政治运动。1924年,非基运动掀起又一浪高潮,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教内有识之士为应对非基运动,急于洗刷“洋教”形象,建立中国教会,以廓清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⑬ 陈春生：《本年教会大事概论》，第8页。

^⑩ 高伯兰、谢颂羔：《中华基督教会之近况》，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9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7年，第160页。

⑮ 张葆初：《长老宗略史与其合一运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年会年鉴》第8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5年，第51页。

第8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5年,第31页。

⑬ 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四册》,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9月),第2082页。

* ⑬ 陈春生：《本年教会大事概论》，第9页。

^⑩ 即美国北长老会、伦敦会、公理会、加拿大长老会、巴陵会、瑞丹会、纽西兰长老会及另一个会。

⑭ 即荷兰改良会、英国长老会、伦敦会。

形势逼人,而长老会“尚等自立派或他会派之加入联合”。^⑭这时长老会内部分成三派,一是纯长老会,二是长老会与自立会联合的会派,三是纯自立会派。三派都希望联合别的教会成为一个大教会。长老会差会认为这是“意气用事,各执一见,致有害于目前可成之大事”。^⑮1924年,长老会有5个大会,31个区会。由于广东、闽南8个区会已经合一,剩下的23个区会中有15个表示赞同,^⑯苏州区会一票至为关键,赞同则超过三分之二,不赞同则不到三分之二。^⑰后有人经详细考证,全国共有32个区会,剩下24个区会需表态,^⑱更需要苏州区会这一票。而苏州区会是纯自立会派。1923年,苏州区会组建了“筹备自立执行委办”,甚至有传教士参与其中。^⑲ 闸北堂堂会是苏州区会中成立较早、最彻底实现自立的大教会,其态度直接影响苏州区会这一票。因此,长老会对此“异常之情形,必用异常之方法”^⑳加以解决。闸北堂风波平息后,“苏州区会从前本处反对地位……居然一变而为一致赞成通过。”^㉑ 长老会临时总会马上召开会议,通过了组建中华基督教会的提议。此前,伦敦会、公理会最高会议执行委员会早已决议联合。所以,会议最后一天请此两会的执行委员开联席会议,使中华基督教会临时总会获得法理上的合法性,同时设立总会事务所,处理建会具体事务。因战事连年,才拖至1927年10月正式成立全国总会。

由前述各节可见,这场风波是“自立”和“本色”的矛盾在关键时刻的总爆发,风波的性质是“自立”与“本色”的博弈。

④《通问报》(总)989回(1922年2月),第2页。

⑬ 同上。

^⑭ 张葆初：《长老宗略史与其合一运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年鉴》第8期，第51页。

⑧ 王完白：《全中国长老会总会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通报报》（总）1221 回（1926 年 10 月），第 3 页。

①《通问报》(总)1219回(1926年9月),第10页。

①⑤ 子贤：《西人自立第八声》，《圣报》第十三年第五期（1923年5月），第11页。

④⑤ 《通问报》(总)989回(1922年2月),第2页。

⑭ 王完白：《全中国长老会总会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第3页。

七、“自立”与“本色”的本质区别

在于对教权的态度

1. 自立教会和本色教会对教权的态度不同

本色教会和自立教会的宗旨都有“自治、自养、自传”之类的内容,在字面上相似,甚至和1950年代“三自爱国运动”的提法一样。但各方的关注顺序和实践程度完全不同,这些“不同”的本质区别是对教权的态度不同。

本色教会中传教士的关注顺序是“自养、自传、自治”。从基督教传入中国至1949年,他们对自养的提倡、引导、督促贯穿始终,不遗余力。协进会宪章中的“三自”,“自养”在首位。高伯兰^⑭在中华基督教会成立时指出:“教会当前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养。”^⑮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了差会津贴的来源,差会千方百计敦促本色教会自养,甚至“有时至为勉强,所以使中国教会感觉到痛苦而不乐意”。^⑯但庞大的教会机构和众多附属事业,远超中国基督徒的承担能力,不得不主要靠差会津贴。在自养能力最强的上海,1950年度,美国北长老会总差会通过沪机构“美国北长老会上海支部”资助中华基督教会中国长老会、上海清心中学及清心女校、基督教普益社125万美元。对于“自传”,传教士是逐步认识其意义的。基督教传华之初,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和尊重,深恐把基督教混同于儒学或佛教,将与之同命运,重蹈景教和也里可温教的覆辙,因而反对基督教中国化。20世纪后,传教士们逐步认识到基督教要在中国生根,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他们在这方面有优势,因此开始大力提倡、支持中国教会领袖“自传”。对于“自

治”,不同层次的传教士态度不一。一般而言,越是差会高层,越多顾及中国社会压力,越多考虑传教效果,越倾向于放权。面对义和团运动对教会的影响,1907年的传教士大会调整了传教政策:“定议培养中国教会自立之心,令其能善为督理各务。”^⑰1913年成立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就是为落实爱丁堡大会精神,要“使华信徒知传教事业极为重大,仅恃少数西宣教师之力为不足。职责所在,各当奋勉。以图教会自立、自行布道,以养成其自行发展之能力。”^⑱1922年成立的协进会,重要职责就是“协助各地更普遍的承认中国教会在国内之基督教运动中,当占中枢地位,注意并研究中国教会之自养自治自传之进步。”^⑲面对五卅运动、国民革命和非基运动的又一波高潮,1927年1月,穆德^⑳到沪召开会议,决定:“全部基督教事业的行政,包括一切已得或未得中国补助的团体,应当赶紧移交给中国教会。”^㉑并催促中国教会创立管理机关,以接受差会所管产业。事实上,直到1949年,差会并未真正移交权力。这与天主教普世教会与各国在华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颇为相似。^㉒当然,不同国家的不同差会,不同信仰特点的差会,同一差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甚至不同传教士对教权的态度并不一致,以上仅述其概。

^⑭ (英)莫安仁译,(华)杨味西述:《百年大会集议》,《中西教会报》(1907年7月),第32页。

^⑮ (美)司德敦:《调查中国宣教事业之露布》,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5期,第174页。

^⑯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宪章》,《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一届年会纪录》,第1页。

^⑰ 穆德(John Raleigh Mott, 1865-1955),美国人,世界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美国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第一任主席,来华传教士中有大量受其影响立志传教的学生;国际宣教协会主席,是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关键人物。曾经7次到中国,对中国基督教发展方向极具影响力。

^⑱ 董健吾:《中西瞩目的穆德会议》,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9期,第153页。

^⑲ 1919年,天主教教廷从有利于传教出发,发布“夫至大”通谕,要求在传教区能自立自理时,让本地人自理,传教士到别处开教。法国势力为维护其国家利益,不宣布和执行这一通谕。上海国籍神职人员知情后,倡议国籍浦东教区,掌控上海天主教的法国势力即以分裂教会罪名处理为首者。1922年,教廷在派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时,为避法国保教权,不得不隐瞒身份入华,得以物色6位华人为主教,成为近代以后中国首批本国籍主教。

^⑭ 高伯兰(Asher Raymond Kepler, 1879-1942),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901年来华,在南京、宁波、湘潭、北京等地传教40年,长期担任中华基督教会的总干事或执行干事,后担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他的态度具有代表性。

^⑮ 高伯兰:《中华基督教会总会概述》,第4页。

^⑯ 黎天锡:《充实中国教会基础的两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3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6年,第12页。

本色教会中的中国人关注和着力的顺序是“自传、自养、自治”。他们主张教权而难得。他们早就提出“不图外国势力保护而有碍中国主权,造就中国领袖人才”等等要求。诚静怡明确指出,“把控制权从差会移交到教会”,^⑩是本色化最有效的方式。协进会会长余日章明确指出:“教会管理权移交中国领袖已成当前必走的一步。”^⑪但各差会就是不放权。他们想方设法提倡和推动自养,但力不从心。他们只能发挥自身优势,在自传方面多做努力。他们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方面做过不少有价值的探索,出版了一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论著,^⑫在教会建筑、音乐、美术、节日、礼仪的中国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立教会关注和着力的顺序是“自治、自养、自传”。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发起原因就是挽回教权,^⑬自治是他们首要、基本、核心而迫切的诉求。他们拒绝西人“插足其间”,是拒绝他们插手教权,并非一概排斥传教士,凡主张和支持自立者,均热情欢迎,与之合作。1922年,自立会还“册立”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白秀生为全国总会顾问。^⑭自养是自立会生存的基础,是一种骄傲,也是牵制自立会大量精力的一道难题。但无论如何困难,必须自养,否则只能放弃自立。对自立会而言,自传问题虽没有自治和自养那么迫切,但也作了不少努力。^⑮

^⑩ C. Y. Che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Church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l. 12 (1923), p. 369. 转引自刘家峰:《从差会到教会》,第219页。

^⑪ 钟可诤:《年来中国教会状况之观察》,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9期,第7页。

^⑫ 如赵紫宸的《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王治心的《教牧与中国文化》、谢扶雅的《新时代的信仰》、胡貽谷编的《现代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等等。

^⑬ 张化:《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发起原因研究》,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⑭ 《教会自立之最好消息》,《圣报》第十二年第七期(1922年7月),第13页。

^⑮ 自立会信徒来自各教派,信仰特点各异,总会取宽容、包容态度,只规定了一些原则性信条。总会制定了“婚丧公礼”等礼仪条文,编辑出版过适合自立会使用的《颂主诗歌》。自立会也提议将中国文化注入基督教进行礼仪改革,在教堂布置、节庆、诗歌内容和曲调等方面体现传统文化。各地自立会所建教堂,包括永志堂,多为中国风格;总会也设计过国画风格的神迹图;其他方面实践效果记载较少。

2. 差会和教会上层人物非常清楚“自立”和“本色”的这一本质区别

1913年,穆德到沪,虽然待办之事“多如山积”,还是赶赴俞国桢处,“忠告”他们不要另立门户,应走与差会合作之路:“中国教会实行自立为教会史中绝光明灿烂之一事实……其必须注意之第一事,即当与各国教会往史联络,成其系统之一分体,不可与之断绝关系……不然,悍然不顾前人之成规,持一维我独尊之见,而欲自造命运,则其艰难奚止十倍……今代卓识之士,尤当与相接近,以得其指教引导。是故各国教界巨子,硕德伟人,凡足发扬基督教清洁活泼之精神者,宜熟与往还。”^⑯1920年代,他们又清楚地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教会进行区分:一种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为代表,“在各宣教会所代表的教会组织范围以外,从既自养又自治的意义上讲,它们是自立的。”^⑰一种以华北中华基督教会联合会为代表,“它们同原属的差会还保持着恳挚而互相帮助的关系。”^⑱

3. 当时人、自立教会与本色教会的当事人也非常清楚这一本质区别

陈金镛在金陵神学院当了10多年教授,还担任《金陵神学志》首任主编、广学会编辑,在协进会成立之初,他应自立会之邀撰文,敏锐地指出两者“主张或有不同”。^⑲

在非基运动新一波高潮中,从本色教会中分离出一大批自立教会,仅温州一地就有40个教堂宣布脱离英国差会而自立。北京早就建立中华基督教会,又远离北伐锋芒,中国信徒也成立了北京教会自立运动筹备会。1927年3月20日召开了筹备会第二次大会,要与西教士交涉,“收回教权”。^⑳

^⑯ 寓公:《穆德博士对于中国教会之忠告》,《中国基督徒报》第50号(1913年冬),第3页。

^⑰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蔡咏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内部版,第817页。

^⑱ 同上。

^⑲ 陈金镛:《祝国庆》,《圣报》第十二年第八、九期(1922年9月),卷前第3页。

^⑳ 卢广绵:《北京教会自立运动筹备会第二次开会记》,《真理与生命》第2卷第6期(1927年4月1日),第169页。

自立会对协进会本色教会委员会委员长刘廷芳等人对本色教会的解读很不以为然。^{①②} 俞国桢始终留意与中华基督教会划清界线。该会成立后,时常派人拉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入会。自立会中也有少数人主张加入,俞国桢随即制止“此种极端错误之主张”^{①③}。“中华基督教会总会中执行指挥的人,为西教士同几个受外国俸给的留学生。会中经费,是来自外国。物质上、人才上的关系,既如是密切,他精神上主张上,自然要受西人的牵掣与暗示……这样的教会,不过系几个中国人撑撑场面,外国人仍隐在背后,拉他的提【绳】^{①④}戏。”^{①⑤}“此种办法吾人亦承认其为应付时局趋势,减少反教空气之最好处置……我自立会……设会宗旨系由国人激于爱国热忱,欲思挽回宗教主权,弥补教会缺陷,保全民族独立自尊性,因而发起另行组织、完全自立的统一的教会……与所谓中华基督教会者截然不同。”^{①⑥}

八、风波对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 乃至对中国基督教史的影响

在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中,闸北堂风波是一个转折点,经过此点,自立运动的走向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本色化运动和合一运动的走向,对中国基督教史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1. 风波后,自立会公开与“西人”争教权

风波前,自立会不敢公开向“西人”主张教权。1906年,自立会公布的宗旨是:“本会既命名自立,凡事不假外力之力,俾教案消弭,教旨普传,及调和民教,维持公益,开通民智,保全教会名誉国家体面为目的。

各会华教友无分彼此,不限区域。以期联合同志,鼓舞自立之精神,建立自强之基础。”自立会的重要目标没有、也不能公布:取消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挽回教权。这一目标在“宗旨”中委婉地表述为“保全教会名誉,国家体面”。清政府覆灭前的1911年4月,俞国桢略有透露,“意图调和民教,挽回主权地步。”^{①⑦}这一透露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浙江省基督教会联合会紧急召开专题会议,大有发动全国基督教界对俞国桢围而剿之的态势。^{①⑧}俞国桢不得不作出调整,1911年9月公布的简章增加了“为西国差会在内地传教者求恩”^{①⑨}的内容,区别对待差会和传教士。清朝覆灭后的1915年,自立会婉转地表达为“痛恨于先朝之误订保教权也”。^{①⑩}

风波后,自立会首次亮出自己的主张,公开与“西人”决裂。1925年,自立会在《申报》发布通告:吾会“二十余年前已窥破西人侵略欺人之隐而力辟其奸,毅然脱离关系,由华民自立自养自传”。^{①⑪}1927年,自立会在没有召开新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公布了新的章程草案,其宗旨中出现了“挽回教权”的内容。^{①⑫}1930年,自立会副会长柴连复分析当年俞国桢在已任中国基督徒会会正,又创办自立会的原因时,明确指出:“(俞)公注重挽回教权。”^{①⑬}这正是自立会的核心诉求,也是自立会与差会无法调和的矛盾。

经此风波,俞国桢与出面处理风波的大会、区会代表反目,使他从此在长老会无法立足。由前述可见,大会委办委员有3人,都是老资格的传教士或传道人。区会全权委办2人、委办5人,都是上海和苏州地区长老会德高望重者或青年俊杰。^{①⑭}风波后,俞国桢从长老会退

①② 《协进会谬谈本色之意义》,《圣报》第十五第七期(1925年7月),第9-10页。

①③ 湘:《本会一个紧要的释疑》,《圣报》第十八第四号(1928年4月),第2页。

①④ 原始资料中该字不清,笔者揣摩为“绳”。

①⑤ 宗周:《释疑》,《圣报》第三百十六期(1928年12月),第1页。(这一期,期数编法特殊,且有刊误,恐是第二百十六期。其实自创刊以来,这是第202期。)

①⑥ 湘:《本会一个紧要的释疑》,第3页。

①⑦ 《上外务部禀附批》,《中西教会报》1911年4月,第47页。

①⑧ 张化:《俞国桢与“贡经”风波》,《当代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①⑨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简章》,《圣报》第一期(1911年9月),第10页。

①⑩ 《自立会与清史馆》,《圣报》第五年第四期(1915年4月),第6页。

①⑪ 《耶稣教自立会总会之通告》,《申报》1925年6月13日。

①⑫ 《本会现行章程草案摘要》,《圣报》第十七年第三期(1927年3月),第17页。

①⑬ 连复:《耶稣教自立会史略》,《圣报》第二十卷第四号(1930年4月),第2页。

①⑭ 区会全权委办之一诸重华是长老会苏州阊门专诸巷堂的牧师,长老会在苏州的社会服务机构普益社的创办人和总干事。此时,恰逢江浙战争,普益社承担红十字会救(转下页)

休,此后,不见他参与长老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任何活动的记载,只是经常“扶杖”到闸北堂参加礼拜。^⑤ 自立会参与协进会的活动也只是例行公事。

2. 自立会从此得不到上海工商界的支持和资助

本来,自立会离差会而去,在政治上只能依靠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经济上主要依靠工商界和士绅。俞国桢在闸北堂能够实现自立,主要是得到上海工商界的支持,特别是商务印书馆资方诸人的资助。闸北堂2次迁址,均为跟随商务印书馆,数次扩建、迁建都与商务印书馆的数次飞跃同步。

风波中,俞国桢与起事人、调停人反目,意味着与原来的支持者和上海基督徒中的所有实力派人物分手。如前所述,2个起事人除了是长老会和闸北堂的骨干,还是自立会的支持者。8个调停人都是上海基督徒中的实力派,大部分是上海工商界赫赫有名、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⑥ 起事人、调停人、区会全权委办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⑦ 起事人和调

(接上页)济工作,成绩卓著,普得赞誉。有趣的是,他在普益社与美国传教士争权,为长老会所不悦,1938年逃难到沪,长老会已合一为中华基督教会,规模空前,竟不安排其工作。他只得改受浸礼,入老北门浸会堂任牧师。另一位全权委办李恒春是长老会上海清心堂老资格牧师。代表区会到闸北堂当众道歉的刘道生是长老会苏州齐门外崇道堂牧师。区会委办中,陈金铺见前述;汤仁熙是上海青年会总干事、清心堂牧师;金有方是长老会上海川沙城兰芬堂牧师;钮立卿是上海青年会代总干事。

⑤ 徐亦庄口述、周金卿笔记:《本堂掌故之二》,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六十周年、新堂落成纪念特刊》,第80页。

⑥ 郭挺生是中国烟草业著名买办,1912年与英美烟公司合资经营烟草种植、制造、进出口、销售。1913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国务院咨议,1922年任全国纸烟捐务总局总稽核。赵晋卿时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届华人董事;在教内,是沪江大学等数校校董、广学会百科全书经理、青年会会长。鲍武昌、高风池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鲍武昌时任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高风池任监理,王显华任经理(即副总经理),都是最高管理层核心成员。鲍哲泰是上海煤业巨子,1904年即任海宁路堂长老。曾绍贤是上海老北门第一浸会堂牧师。陈金铺曾任金陵神学院教授20年,时任广学会主任编辑员。

⑦ 陈金铺身兼两职,既是区会委办,又是调停人。陈芷谷是陈金铺的老师,与鲍咸亨是连襟。鲍武昌与鲍咸亨是兄弟。高风池与鲍武昌是同学、同事、儿女亲家、商务印书馆创办人。曾绍贤与诸重华的弟弟诸辛生曾义结金兰。

停人共10人,8个是宁波人,^⑧而且是在沪宁波人中的佼佼者。以他们对上海工商界的影响力,他们对自立会的态度基本可以代表上海工商界的态度。俞国桢脱离了这张关系网的保护,意味着将失去上海基督教界和工商界的支持。风波中,失去支持的后果已初步显现:聂云台收回捐赠地皮承诺的理由就是自立会“单独”行事,怀疑“是否有添建总会堂所之必要”。^⑨ 风波后,自立会再也没有得到上海工商界,包括商务印书馆资方诸人的大笔资助。闸北堂信徒多为商务印书馆职员、职工,风波后,仍然就近在闸北堂礼拜。包括风波中竭力主张自立的徐亦庄也担任了闸北堂董事、长老执事董事联席会议议长;俞国桢的妻子、子孙也都仍为闸北堂信徒。^⑩

自立会从此只能走平民路线,靠聚沙成塔式的捐款来维持会务、筹建总堂,捐资者主要是基督教知识分子、职员和各地信徒。总会定了各种捐项、各种募捐和奖惩办法:1920年,自立会全国总会开始收“2角捐”充常年经费,即每人每年捐2角钱,此捐后来定名为“自立捐”,但从未收全过;以往赠阅的《圣报》因经费困难几欲停刊,后改收《圣报》捐;^⑪1923年起,定7月2日为自立节,这天的纪念捐也上缴总会;又专设了建堂捐、特别捐等捐项;参加1930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除自备川资旅费、自带行李帐子外,还要交2元会费。尽管如此,还时常“困难已达极点”。^⑫ 风波后,俞国桢主要精力用于筹建全国总会总堂。他多次派人到南洋、浙江、福建等地筹款。1929年,他已年近八旬,因建造总堂尚有亏空,亲自赴浙江平阳巡游布道筹款,因过劳得病。回沪后即中风病倒,2年后病逝。^⑬

⑧ 只有赵晋卿和高风池不是宁波人。

⑨ 《驳大中华厂总理反教辨惑复函》,第11-12页。

⑩ 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六十周年、新堂落成纪念特刊》,第3,83页。

⑪ 《俞宗周三次通告各省自立会》,《圣报》第十二年第三期(1922年3月),第1页。

⑫ 《本馆聘请维持员并募捐奖则》,《圣报》第十六年第十一、二期(1926年11月),第29页。

⑬ 《俞宗周太太的自述经过情形》,《圣报》第二十卷第七号(1930年7月),第4页。

3. 风波后,自立会和本色教会的发展势头完全逆转

风波前,自立会发展势头迅猛,达到顶峰;风波之后,发展势头受挫,逐渐衰弱;本色教会稳步发展,逐渐成为主流教会。

风波之后数年间,虽然正逢非基运动新一波高潮,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自立会发展。但是,一方面各地各种名目的自立教会及组织纷呈,未成合力;另一方面,自立会在新增分、支会的同时,一部分老的分、支会或离开自立会,或毁于兵匪,教堂总数竟略有所下降。1930年10月,自立会在永志堂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3人,只有第一次大会的44%。大会举行“四典礼”,即庆祝自立会成立25周年、《圣报》创办20周年、第一次全国大会10周年、全国总堂开幕。这次大会具有庆典性质,未对自立运动的发展方向作出部署,相反由他人在大会上介绍另立的中国耶稣教会联合会,并讨论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分工合作关系。会后,自立会全国总会成立总务科,维持日常事务。1932年,“一·二八”战火毁掉了俞公馆和总会事务所,永志堂建筑受损,信徒避走租界,自立会深度受挫。11月,俞国桢逝世,自立会从此一蹶不振。1933年,自立会召开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深觉前非,思有以改弦易辙,严加纠正,重申目标。”^⑩大会对宪章作了较大修改,削弱了自治、挽回教权的内容,增加了“实现本色之基督教会”的内容,^⑪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核心目标,也失去了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此后,自立会领导人多换,组织能量渐弱,各地自立教会不少回到原宗派或改宗本色教会,教堂数和信徒数渐少,^⑫差会逐渐不再在意自立会。

风波后,本色教会逐步发展为主流教会。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上依靠美国,以美国为主的差会及其控制下的本色教会成功蜕变为“中国教会”,社会影响逐步扩大,至1950年,仅协进会旗下

^⑩ 王鸿:《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近两年来之检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3期,第22页。

^⑪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章》原件,上海档案馆档案:U114-1-1,第2页。

^⑫ 1930年有教堂294个,1947年剩下211个,1950年有信徒11564人,只及高峰时的一半。

就有信徒约55.9万,约占中国基督徒的58.96%,^⑬成为主流教会。

九、余 论

1. 不同层次传教士对教权的不同态度,导致差会和受差会控制的本色教会在自治方面呈现说得多、做得少的现象

1950年后,被迫撤离中国大陆的差会和传教士总结在华传教的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差会在促进中国教会自立方面“说得多、做得少”,“太多的传教士对教会机构的经费、政策、方法和活动的控制时间太久。”^⑭这一反省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准确地描述了差会与中国教会的关系以及中国教会的生存状况。那么,不同层次传教士对教权的不同态度与这一现象关系何在?

如前所述,传教士联合召开或由差会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和上层传教士在促进中国教会自治方面作过恰当的决策,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只是各国差会和大部分传教士基于对本国、本差会或本身利益的考虑,包括人性中的陋习——不愿被取代的权力欲,^⑮在教会实践中加以抵制。这种抵制低调但非常有效。大会决议和上层传教士的言论往往被记载、出版和宣传,广为人知;各差会和广大中下层传教士不会、也没有舞台论述不放权的理由,也不会宣传不放权的做法,相反只会将不放权的做法加以包装,貌似积极放权或积极准备放权。所以,我们看到了“说得多、做得少”的现象。

^⑬ 这一数字和比例根据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50年编印出版的《订正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该调查录记载协进会有14个教会团体,其中11个团体有信徒人数;友爱会、两广浸信会、礼贤会无信徒人数,未加统计,但此3个教派较小;该调查录记载中国有25个教会团体,除了协进会团体,还有中国基督教来复会、救世军、耶稣家庭无信徒人数,前2个教派人数较少,未加统计,耶稣家庭据其他资料加了1.2万人;总数为948021人。

^⑭ Harold Matthews,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Miss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March 30, 1951).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Record Group 8, Box 56. 转引自刘家峰:《从差会到教会》,第231页。

^⑮ 这一观点来自于邢福增的会后点评。